

## Stalin's Strategic Planning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Reading a Selection of Declassified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 Sino-Soviet Relations, Vol. 1

Yu Weimin

**Abstract:** In the later phas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the Yalta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big power cooperation, division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maintenance of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s reached by Stalin and Roosevelt at Yalta, China's Northeast and Outer Mongolia were included in the Soviet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the Far East. In Stalin's strategic planning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he adopted a dual strategy for the purpose of guaranteeing Soviet influences in East Asia. The first goal of the strategy was to consolidate, through diplomatic channels, “interests and rights” that the Soviet Union had obtained by then. The second was to find and catch right opportunities to establish pro-Soviet regimes in areas under Soviet occupation by activating the “revolutionary network” that the Comintern had previously established. In August 1945, the Soviet Union, through the making of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forc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accept the Yalta Agreements. In the meantime, Moscow also tried to use former Chinese officers from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 who during the war years had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viet Red Army's 88<sup>th</sup> Brigade in the Far East, to establish a pro-Soviet regime in China's Northeast. During this process, along with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military-political status afte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dispatch of its troops into the Northeast, Stalin adjusted his strategies. By the end of 1945, the units originally belonging to the 88<sup>th</sup> Brigade were merged with the CPC-led “Northeast Democratic United Army.” In the wake of Stalin's strategic adjustment, the CPC gained the external support, as well as the Northeast base area, that proved to be of utmost importance in the Party's competition for China's political power, which greatly accelerated the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1949, when the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became clearer, Stalin secretly dispatched Mikoyan to Xibaipo, defining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state-to-stat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ew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The new form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together with the “world revolution” mechanism that the Soviet Union had initi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new Sino-Soviet relation, decisively undermined the Yalta System in Asia. Consequently,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also evolved from “great power cooperation” to the Cold War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great power confrontation” worldwide.

**Keywords:** Yalta System; China's Northeast; Stalin; Sino-Soviet relation

**Author:** Yu Weimin is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dean of ECNU History Department from 1999 to 2009). He graduated from ECNU, receiving his BA and MA in History respectively in 1982 and 1987. At ECNU, he is also a doctoral supervisor,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and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of Russian Studies. In addition, he is vice president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Soviet-East European History Studies, vice president of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His research areas cover 20<sup>th</sup> century world history, Soviet history, and Cold War history. Among his main publications are *Developments and Choices of Modern Civilizations: 20<sup>th</sup> Century World History*;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Social Transition in Russi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Viewing from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and Alternative Choice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Why and How Did the Soviet Model Lose Historical Legitimacy, etc.*

# 斯大林的戰略佈局與亞洲“冷戰”起源

## ——讀《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一卷

余偉民



[摘要]2015年出版的《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內戰發生和亞洲“冷戰”起源提供了重要的歷史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蘇兩國構建了“大國合作，劃分勢力範圍，維持戰後國際秩序”的“雅爾塔體系”。斯大林與羅斯福達成的“雅爾塔協定”給予蘇聯在遠東的勢力範圍，中國東北和外蒙古被劃入其中。斯大林在戰爭結束階段的戰略佈局中，為確保遠東勢力範圍而採取兩手並用策略：一是通過公開的外交渠道落實已獲得的權益，二是擇機啟動共產國際的革命網絡在佔領地區建立親蘇政權。1945年8月，蘇聯通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迫使中華民國政府接受“雅爾塔協定”，並試

圖利用被編入遠東蘇軍88旅的原抗聯部隊幹部在中國東北建構親蘇政權。在此過程中，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共出兵東北形成的軍事政治態勢，推動斯大林調整了原來的戰略佈局——1945年底，原88旅部隊併入中共領導的東北民主聯軍。由於斯大林選擇中共為維護遠東勢力範圍的合作者，自1946年起，蘇聯與中共的關係已成為中蘇關係的主導因素。斯大林的戰略調整，使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獲得了最為重要的外部支持和東北根據地，加快了中國革命的進程。隨着內戰形勢的明朗，1949年初，斯大林派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確定了蘇聯與中共新政權的“國家關係”。中蘇關係的新形態和蘇聯為順應這種新形態而啟動的“世界革命”機制，則在亞洲地區決定性地改變了“雅爾塔體系”，從而使戰後國際秩序在世界範圍內從“大國合作”走向“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雅爾塔體系”是兩個異質制度的大國在戰爭條件下結盟的產物，戰後勢力範圍的劃分及對各自地盤的控制使原來被遮蔽的制度異質性在政權建構中顯化了，被劃入勢力範圍的那些國家的本土性革命因素與大國政治交織在一起，最終將戰後世界一分為二。

[關鍵詞]雅爾塔體系 中國東北 斯大林 中蘇關係

[作者簡介]余偉民，1982年、1987年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獲歷史學學士和碩士學位；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1999—2009年兼任系主任）、博士生導師，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俄羅斯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任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副會長，上海世界史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20世紀世界史、蘇聯史、冷戰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現代文明的發展與選擇——20世紀世界史》、《論俄羅斯社會轉型的特殊性》、《冷戰的起源與終結——世界歷史的視角》、《“替代性選擇”和“比較優勢”——蘇聯模式為何喪失歷史合法性》等。

2015年，中國內地出版了十二卷本《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sup>①</sup>，系統展示了1945—1991年這四十七年間的中蘇關係發展脈絡。其中反映的諸多歷史場景，不僅僅涉及中蘇雙邊關係，而且從中蘇關係的視角折射出世界歷史的宏觀變遷和重大轉折。以第一卷（1945.1—1949.2）為例，此階段的中蘇關係檔案文獻所呈現的美、蘇與中國國民黨、共產黨“三國四方”縱橫捭闔、各種力量此消彼長的複雜歷史場景，為人們理解中國內戰的發生、美蘇關係的演變和亞洲“冷戰”的起源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歷史信息，從而為深入探討和重新認識這些影響戰後世界格局的重大問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即1944—1945年間，主導反法西斯聯盟的美、英、蘇三國舉行了一系列首腦會議，討論戰後世界的安排，構建了戰後國際秩序的基本框架和運行機制。由於雅爾塔會議的影響最為突出，故名之為“雅爾塔體系”。雅爾塔體系的核心原則是“大國合作，劃分勢力範圍，維持戰後國際秩序”。正是在雅爾塔會議期間，羅斯福（F. D. Roosevelt, 1882—1945）和斯大林（И. В. Сталин, 1878—1953）達成了關於戰後遠東地區勢力範圍劃分的“秘密協定”。後來，按照遠東戰局的實際進程和雅爾塔協定精神，蘇聯除獲得千島群島和南薩哈林島（庫頁島）領土外，中國東北、外蒙古、朝鮮半島北部也被劃入其勢力範圍；美國則獲得對日本本土的控制權，朝鮮半島南部和中國大部分地區也進入其勢力範圍。在這樣的安排中，既體現了美蘇兩國對戰後秩序的支配作用，也滿足了雙方的利益訴求，因此達成了“大國合作”，體現了美蘇的戰略協調。由於蘇聯在雅爾塔體系中獲益良多（領土、勢力範圍和權益），因而是體系的肯定者和維護者。但是，雅爾塔體系並非蘇聯追求的唯一目標，蘇聯在戰爭結束後出兵東歐和遠東的戰略佈局已經顯示出，除了從“大國合作，劃分勢力範圍”中獲取利益外，在戰爭勝利的條件下，一度因“共產國際”解散而內隱的“世界革命”的目標也獲得了新的動力。在戰爭結束階段的戰略佈局中，蘇聯往往採取兩手並用的策略，一是通過公開的外交渠道落實雅爾塔體系給自己提供的權益，二是啟動共產國際的革命網絡為佔領地區的政權建構服務。當然，在戰後初期出於蘇聯的直接安全需求，這一目標還是與鞏固勢力範圍和安全地帶的防禦性戰略結合在一起，以扶植佔領區親蘇政權為主要形式，但蘇聯制度模式也隨之而輸出；而正是這種“非進攻性”的制度模式擴展，對西方國家形成了被稱作“共產主義威脅”的挑戰。

對蘇聯來說，歐洲的勢力範圍劃分（通過所謂“百分比協定”）與其對佔領區的實際控制基本一致，但雅爾塔體系在遠東的佈局卻存在着一個法理與權力不相吻合的“模糊空間”。與蘇軍佔領下的東歐各國和北朝鮮不同，蘇聯在中國東北地區難以建立直接聽命於自己的親蘇政權，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對東北地區仍然享有合法的主權，而以美國為後盾的蔣介石政權不可能成為蘇聯的傀儡，由此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中出現了與其戰略目標相左的異己政權及其帶來的“不確定狀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戰後中蘇關係的第一幕不可避免地上演了“三國四方”的博弈場面。而解密檔案文獻讓人們看到，在這場博弈中，斯大林順應形勢變化推行了兩手策略，並在調整中產生了實際效果。

在斯大林的戰略佈局中，首先要確保雅爾塔協定的兌現。因此，從1945年4月到8月，蘇聯在對華政策上明確以中華民國政府為談判對象，通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落實雅爾塔協定給予蘇聯的各項權益。由於外蒙古獨立、蘇聯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蘇方控制等涉及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蔣介石（1887—1975）不願意讓步，一度成為中蘇條約談判的主要障礙。為了壓服中國政府，迫使其接受雅爾塔協定，斯大林不僅打出了美國牌，而且打

<sup>①</sup> 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第1卷（1945.1—1949.2）。

出了中共牌和新疆牌。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是蘇聯的共謀，斯大林則一再向美國保證：蘇聯不支持中共奪取政權；祇要確保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權益，長城以南的中國就是美國的勢力範圍。為了解除美國的戒心，斯大林和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 1890—1986）在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 J. Hurley, 1883—1963）和駐蘇大使哈里曼（W. A. Harriman, 1891—1986）的會談中故意淡化蘇聯與中共的關係，甚至貶低中共，稱之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以此拉開與中共的距離。莫洛托夫還向赫爾利保證，蘇聯過去沒有今後也不會向中共提供武器，蘇聯的援助將祇提供給國民政府。<sup>①</sup>後來，斯大林在與宋子文（1894—1971）的會談中也重複了同樣的說法<sup>②</sup>。當然，事實並非如此。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蘇聯始終沒有中斷與中共的聯繫，其中包括通過共產國際系統持續向中共提供資金。據檔案顯示，1940年，蘇聯一次性給予中共的資金即達30萬美元；在蘇聯面對德國入侵的最危險時刻，1941年7月3日，也就是斯大林發表首次戰時演講的當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給予中共100萬美元資助，<sup>③</sup>可見中共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及其對於蘇聯的長期和潛在的作用。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之後，這種狀況也沒有改變。即使推行“世界革命”的目標被暫時擱置，中共仍然被看作蘇聯潛在的戰略盟友，莫斯科與延安的高層聯繫始終保持（延安長期駐有蘇聯的聯絡員並負責電報通訊）。而且，正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毛澤東（1893—1976）在延安的“路線鬥爭”中取得了對王明（1904—1974）的勝利並確立了在中共的領導地位。<sup>④</sup>祇是在1945年戰爭結束階段，為了落實雅爾塔協定，斯大林纔在中共與國民政府之間做了一個策略性的選擇：用形式上放棄對中共的支持以換取美國和蔣介石兌現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權益。

對中共來說，斯大林的佈局迫使毛澤東改變利用日本投降之機佔領淪陷區中心城市以擴大解放區的計劃，並按斯大林的指示赴重慶談判。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留了一手，沒有停止向東北進軍的計劃。8月28日，毛澤東離開延安赴重慶；次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迅速進入東北控制廣大鄉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要求晉察冀和山東的部隊“用東北軍以及義勇軍等名義……非正式進入東三省”。<sup>⑤</sup>此舉為後來斯大林調整戰略佈局埋下了伏筆。

對於起初不願意接受雅爾塔協定的蔣介石，斯大林打出的中共牌果然奏效，蔣介石為了維持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不得不接受蘇聯的要求。1945年7月8日，蔣介石致電在莫斯科談判的宋子文，讓其在外蒙古和旅順駐軍等問題上接受蘇聯的條件。在電報中，蔣介石提出：“希望蘇聯能夠充分體諒中國在這一問題上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中國政府的誠意——以此犧牲來確保兩國間的和平和牢固的合作關係。”<sup>⑥</sup>此電文由宋子文在9日與斯大林的會談中向蘇方宣讀並據此達成了簽約協定。作為中國政府讓步的底綫，7月10日，中國代表團致函蘇聯政府，要求蘇方就以下三點提供書面保證：“一、中國對東北的主權；二、中國共產黨；三、新疆。”<sup>⑦</sup>後兩條即蘇聯承諾今後不再支持中共與新疆的反政府“叛亂”。而在外蒙古問題上，中方祇爭取到了通過全民公決為自己“找一個臺階，以便減輕其在國內所受到的壓力，並對中國民衆有個交代”。<sup>⑧</sup>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達成了蘇聯的首要目標，接下來的問題是，蘇聯如何通過出兵遠東實際控制雅爾塔協定給予的勢力範圍。正是在1945年8月至1946年初這段時間內，斯大林謀劃了以扶植親蘇政權為目標的戰略佈局。其中，蘇聯與中共的關係及其在東北地區的互動成為遠東時局變化的主綫。在這個過程中，原東北抗聯部隊的幹部成為銜接兩種佈局的過渡性安排。

①②③④⑤ 沈志華 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第27、33、63、63、68、64頁。

③ [俄]亞歷山大·潘佐夫：《毛澤東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卿文輝、崔海智、周益躍 譯，下冊，第507頁。

④ 1938年6月，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執委會“同意”毛澤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完全支持”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俄]亞歷山大·潘佐夫：《毛澤東傳》，下冊，第481頁）。

⑤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15冊，第258頁。

## 二

在蘇聯獲得的遠東勢力範圍中，外蒙古本來就在其直接控制下。早在1921年，外蒙古已經在蘇俄策動下“獨立”；所以，1945年的中蘇談判祇是讓中國政府承認這一“現實”（談判尚未結束，7月7日斯大林在宴請喬巴山時已經“祝賀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sup>①</sup>因此，在蘇聯出兵時尚待建立親蘇政權的是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承認中國主權形式下的實質性控制，最佳方案為建立親蘇的“自治政府”，以此將蔣介石政權和美國勢力摒除在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蘇聯的第一個舉措是將遠東蘇軍第88獨立步兵旅的中國和朝鮮軍人（這些軍人均為原東北抗聯指揮員，1940年後在蘇聯遠東地區受訓）派遣回國，隨蘇軍進駐各中心城市，承擔協助佔領軍對當地的管理職責。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遠東蘇軍司令部具體安排了回國擔任各地衛戍副司令和地方保安團及其他機關成員以接管地方政權的300餘名中朝幹部。其中，在中國東北地區，115人擔任衛戍司令部副司令和助手，153人作為地方保安團和其他機關的成員。第88旅旅長周保中（1902—1964）被派往長春，政治副旅長張壽籓（李兆麟，1910—1946）被派往哈爾濱，旅政治部主任馮仲雲（1908—1968）被派往瀋陽。在北朝鮮地區，第1營營長金日成（1912—1994）被派往平壤，第2營副營長金策（1902—1951）被派往咸興。在派遣命令中，規定了這些中朝幹部的身份和任務：“在蘇聯佔領滿洲國和北朝鮮期間，為了蘇軍衛戍司令部管轄區的秩序，並擴大衛戍司令部在當地的影響，可以讓他們在省會和縣城衛戍司令部的合法機構中擔任軍事代表的副手，也可以加入地方保安團，或者祇是作為當地的居民。”<sup>②</sup>這樣的安排是為了在蘇軍撤走後由這些“當地人”組織地方武裝、接管地方政權，從而成為未來親蘇政權的核心。

蘇聯在北朝鮮的佈局順利實現了預定目標。1945年10月，回到國內的金日成等按照佔領當局的部署建立了共產黨組織和新政權，並按照蘇聯政權模式實施社會改革，在朝鮮半島北部形成了與美軍佔領下的南部地區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但這時的制度性建構並未越出雅爾塔體系的框架，因為它體現了勢力範圍與控制權的一致（這種狀態與東歐地區類似，區別在於北朝鮮沒有本土舊政權的包袱，在漢城重建的朝鮮共產黨也很快被蘇聯當局納入北朝鮮的黨組織系統）。為了確保蘇聯對北朝鮮政權的控制，佔領當局還拒絕了在中共領導下的華北敵後根據地發展起來的“朝鮮義勇軍”武裝力量回國，祇允許這支部隊的幹部以個人身份返回國內。<sup>③</sup>

蘇聯在中國東北的佈局則遇到了複雜的形勢。受命於蘇軍的周保中等原抗聯將領回國後，一方面協助蘇軍佔領當局維持當地治安和社會秩序，一方面積極尋求與失聯多年的中共中央恢復組織隸屬關係。在恢復與中共中央的聯繫之前，周保中等於1945年9月初完成了對東北地區57座城市和縣鎮的進駐，9月中旬於長春組建了以第88旅人員為核心的“東北人民自衛軍”。此舉與蘇軍的意圖吻合，因而得到佔領當局的支持。但很快，第88旅的使命在中國東北宣告終結，因為此時關內的中共軍隊已經大規模進入東北地區。9月14日，駐長春的蘇軍統帥部為了瞭解中共出兵東北的意圖，曾派貝魯羅索夫中校與中共軍隊先頭部隊指揮員曾克林（1913—2007）一起飛赴延安，會見任弼時（1904—1950）、朱德（1886—1976），轉達馬利諾夫斯基（P. Я. Малиновский, 1898—1967）元帥的口信，表示：蘇軍佔領階段，中共軍隊和國民黨軍隊都不能進入中心城市，但“紅軍不久即行撤退，屆時中國軍隊如何進入滿洲應由中國自行決定”。蘇軍代表還在私下應允，已經進入東北的中共軍隊如果不用八路軍名義，不公開與蘇軍接洽，他們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提出希望中共派負責人前往東北，以便隨時聯繫，協調行

①② 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第61、69—70頁。

③ 關於蘇軍佔領下北朝鮮政權的建構，可參閱余偉民：“蘇聯與中朝關係（1945—1958）”，《冷戰國際史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第16輯，第1—20頁。

動。<sup>①</sup>這一信息立即由延安方面電告在重慶的毛澤東。當日下午和晚上，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並作出將全國的戰略重點放在東北建立根據地的決定，同時成立彭真（1902—1997）為首的中共中央東北局。隨後，中共中央又發出電報，要求各地速派部隊和幹部進入東北。9月16日，彭真、陳雲（1905—1995）等乘蘇軍飛機飛抵山海關，轉乘火車進入東北。9月下旬，周保中等與抵達瀋陽的彭真、陳雲等中共中央東北局領導人會面，接上了組織關係。在這種形勢下，周保中等已經不可能也沒有意願按蘇聯的意圖在中國東北複製北朝鮮式的親蘇政權；當他們回歸中共中央的領導後，原來的軍隊建制也被納入中共軍隊系統。10月31日，按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地區所有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統一改編為“東北人民自治軍”。1946年1月1日，統一編制的軍隊改稱“東北民主聯軍”（即後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林彪（1907—1971）任司令，彭真、高崗（1905—1954）任政委，周保中為副司令（在副司令中排序第三）。至此，原第88旅的抗聯系統完全脫離蘇軍，成為中共軍隊中的非主力部分，他們已經不可能繼續履行蘇聯當局賦予的使命。<sup>②</sup>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按既定步驟繼續向東北派遣軍隊和幹部。據統計，1945年8—12月間，中共向東北地區先後派出了10萬人的部隊和2萬名幹部。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在遠東的戰略佈局不得不做出調整；調整的重點在於，如何因勢利導，利用與中共的特殊關係將其納入遠東勢力範圍的總體佈局中。作為佈局調整的先兆，駐東北的蘇軍對待中共軍隊的態度已從開始時相對中立轉向積極合作，據10月4日中共東北局給中央的電報稱：“蘇方表示已下最後決心，大開前門，此間家務全部交我。”<sup>③</sup>雖然這種表態有誇大之嫌，但已經表現出面對既成事實蘇方的一種新的考量。而當時中共也順應着蘇方的需要及其提供的有利條件，力圖在東北（乃至華北等地）建立“自治”政權。<sup>④</sup>

### 三

檔案文獻顯示，正是從1945年10月開始，斯大林在對華政策上逐漸加強了與中共的聯繫和交流，並在1946年春從中國東北撤軍的同時讓林彪指揮的東北民主聯軍接管了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牡丹江等中心城市和戰略要地，加上原先已經被中共控制的廣大農村地區，中共的東北革命根據地由此形成。在這個過程中，蘇聯繼續承認國民政府對東北的主權並與其保持正常的外交關係，在隨後爆發的中國內戰中也公開持中立立場，但實際上斯大林已經在蔣介石與毛澤東之間做出了選擇（當然最後的定盤還得看內戰的贏家是誰）。檔案中有幾份明顯透露出這一信息。

1945年12月底，蔣介石派蔣經國（1910—1988）作為“私人代表”訪問莫斯科，試圖利用中蘇條約借助蘇聯的力量壓制中共在東北的軍事擴張。12月30日，斯大林與蔣經國會談，蔣經國提出請蘇聯出面調停國共矛盾，對中共施加影響，讓其削減軍隊並參與國民政府。斯大林回答：“中國共產黨人並不從屬於俄國共產黨人。共產國際已不復存在。俄國共產黨人很難進行調停，因為他們不想提出最終會被拒絕的建議。況且中國共產黨人並未請求提供建議。”蔣經國反復懇求斯大林“運用大元帥的威望迫使中國共產黨人遵從他的建議”，並保證中國政府願意向蘇聯提供在東北的“優勢地位”。斯大林不為所動，在談話中一再拒絕約束中共在東北的活動，但同時明確東北是“蘇聯的地盤”，不能讓美軍進入東北。<sup>⑤</sup>斯大林在談話中的外交辭令當然不是

① 《中共中央關於東北情況及與蘇軍代表談判問題的通報》（1945年9月14日），轉引自牛軍：“論中蘇同盟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2（1996）

② 按照蘇軍遠東第二方面軍1945年10月15日下達的命令，第88旅於12月11日“徹底解散”（《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第140頁）。

③ 《彭真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第1卷，第309頁。

④ 《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4卷，第57頁。

⑤ 沈志華 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第99—108頁。

中蘇兩黨關係的真實反映。就在這次談話兩天後，即蔣經國尚未離開莫斯科時，中共代表葉劍英（1897—1986）和王若飛（1896—1946）在重慶拜訪了蘇聯大使館，請蘇方提供關於是否接受馬歇爾（G. C. Marshall, 1880—1959）調停的意見，<sup>①</sup>而這是在中共代表團向延安請求指示的同時進行的，可見蘇聯意見在當時中共決策中的地位。稍後，1946年1月7日，毛澤東親自向斯大林發了一封電報，“彙報中共的情況”。電報開頭即就斯大林對自己的關心表達“深深的謝意！”因為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斯大林讓毛岸英（1922—1950）回到父親身邊，還向延安派了兩位醫生為毛澤東治療神經疲勞症。在電報中，毛澤東介紹了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後的工作進展，特別指出由於在東北等地的發展“我們急需工作骨幹”，而毛岸英帶來的斯大林口信——“打算將所有現在莫斯科的中國同志發送回國”——滿足了中共的要求。毛澤東請斯大林將回國的同志“派往滿洲里、齊齊哈爾、哈爾濱，以便他們找到中共中央北滿地下機關……那裏特別需要他們去”。電報還對中國內戰的前景做了預測，表達了戰勝國民黨的信心，“現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力量是一樣的。如果國民黨要繼續這場戰爭，即使他將在一些地區贏得一些勝利（如在位於兩軍交界的瀋陽、熱河和河北省等我黨群眾基礎薄弱地區），但在中國其他廣大地區，他就不敢肯定會戰勝我們”；雖然“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鬥爭仍要走很多彎路和曲折”，但“中國定將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我們對這一切充滿信心”。<sup>②</sup>

將這封電報與同一時間斯大林與蔣經國的談話記錄對照閱讀，可以發現斯大林當時戰略佈局中平行的兩條綫：在公開的外交領域繼續雅爾塔協定和中蘇條約的軌道，給予蔣介石“合法”的主權地位，但不給他實質性的幫助；與此同時，斯大林已經重啓“共產國際”的黨際關係網絡，通過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秘密聯繫渠道，在國共內戰發動前夕已經對中共展開實質性的援助，其中包括允許中共控制東北的大部分地區，並向中共派遣急需的幹部。儘管當時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還沒有建立起後來那樣的信任關係，斯大林也不可能像指揮金日成那樣左右毛澤東的行動，但是在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已經明確站在了毛澤東一邊。這一選擇固然與共產黨人的意識形態和世界革命戰略有關，而更為直接的原因則在於斯大林為了鞏固遠東勢力範圍必須尋找有利於控制中國東北的可靠合作者。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明白這一點，蔣介石派蔣經國充當說客即是想給斯大林吃顆定心丸，但國民黨的美國背景和蔣介石的反共取向使其祇能充當落實雅爾塔協定的角色，而難以成為蘇聯可靠的盟友。毛澤東雖然不是斯大林親自培養的中共領導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國際形勢的變動中，延安始終沒有背離蘇聯的路綫，一直聽取斯大林的指示；“共產國際”解散後，中共在莫斯科仍然保留着代表處，兩黨的關係在各自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中斷。而且，在斯大林看來，毛澤東在抗戰期間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與自己在戰後勢力範圍中扶植“人民民主政權”的目標是一致的。於是，當斯大林需要在雅爾塔體系之外為鞏固遠東勢力範圍而尋找中國的合作對象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就成為最具現實可能性的選擇。斯大林讓毛岸英回國便是發出了明確的信號，毛澤東對此心領神會，在重慶談判問題上他已經領教了斯大林的戰略意圖和策略手段。當時斯大林擔心中共與國民黨的爭鬥破壞雅爾塔協定的落實，現在斯大林需要中共在東北地區抵制國民黨和美國勢力的滲透，維護蘇聯的權益，而建立東北“自治政府”也正是毛澤東奪取全國政權的第一步。兩者在戰略目標上終於達成了一致。但在實現這一目標的實際進程中，雙方還需要磨合，以真正建立起彼此的信任關係。

#### 四

由於斯大林選擇了中共作為自己在遠東勢力範圍的合作者，將國民黨勢力逐出東北地區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如果說1945年8月蘇軍進入東北時遇到中共軍隊尚屬意外，那麼到1946年

<sup>①②</sup> 沈志華 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第111、121—122頁。

春蘇軍撤離時將東北交給中共已經是一項正式的安排。在此時的斯大林戰略佈局中，東北地區已經沒有蔣介石政權的位置。如果國民政府還試圖用軍事力量維持其對東北的“主權”，那麼一場軍事較量就不可避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歇爾調停的失敗不僅在於國共兩黨水火不容，而且在於蘇聯對華戰略的調整使中共奪取政權獲得了斯大林的允准。當然，在斯大林的新佈局中，給中共開出的第一張“通行證”還是在長城以北的東北地區，他的首要目標仍然是確保勢力範圍的權益。如果中共也滿足於在東北建立新政權，那麼蘇聯就可以繼續在雅爾塔體系範圍內與美國合作，而這種局面也是美國能夠接受的一種安排。但是，正如毛澤東在聽命赴重慶談判的同時大舉出兵東北並使斯大林不得不接受這一現實，同樣的事態發展邏輯又一次在國共內戰進程中重演。從1946年7月內戰全面爆發到1949年中共奠定勝局，戰爭進程的節奏都在毛澤東掌控之下，而斯大林祇是一位觀察者和間接指導者。由於當時國內外各種因素都朝着有利於中共的方向集聚，短短幾年間內戰形勢即出現誰都沒有預見到的局面，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蔣介石政權的崩潰如此之快甚至出乎毛澤東自己的預料。顯然，斯大林的新佈局在時間和空間的考慮上都滯後於形勢的發展，他不得不放棄“東北自治”、“隔江而治”等保守的預期方案，接受了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既成事實，並承認自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犯了估計不足的“錯誤”。<sup>①</sup>

檔案文獻顯示，1946—1949年間，隨着東北地區及關內國共內戰進程的發展，蘇聯與中共的關係事實上已經成為中蘇關係的主綫，雙方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各個方面展開了日益密切的合作與協調，蘇聯控制下的朝鮮新政權也為中共在東北地區的戰役部署和後勤需要提供了幫助。與此同時，蘇聯與蔣介石政權的關係則逐漸弱化，尤其是當國民黨軍隊被逐出東北地區、內戰形勢日趨明朗後，蘇聯與中共在東北地區實際上已經在按照兩國關係處理雙邊事務。蘇聯從1947年起持續不斷地向中共建立的東北民主政府提供援助資金、工業設備、產品和原料，還派遣專家幫助制定經濟計劃以恢復被戰爭破壞的工業和民生。<sup>②</sup>這種舉措與此前蘇軍佔領時期大肆拆解東北地區的工業設施、掠奪設備物資適成鮮明對照。內戰期間，蘇聯給中共軍隊的武器援助也十分可觀，除了將繳獲的大量日軍武器裝備移交給中共軍隊，在給東北的援助中軍事物資約占四分之一，後期還應中共的要求提供了高射炮等防空武器，這些軍事援助“是無償的”。<sup>③</sup>但是，直到蔣介石政權最後倒臺，蘇聯與國民政府的外交關係始終未斷，這反映出斯大林的新佈局仍然存在機會主義的一面——不到最後一刻，他仍想獲取來自兩方面的好處，包括與美國維持雅爾塔體系的平衡。正是這種機會主義曾引起毛澤東的疑慮和不快，此期間毛澤東與斯大林的幾次電報往來透露出雙方在如何把握中國革命發展進程上存在的認知差異和彼此間的互相摸底心態。

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向斯大林報告戰爭第一年的戰績並對今後的戰局提出預判。在這封電報中，毛澤東表達了對奪取政權的樂觀和自信，並明確提出，“在中國革命最終勝利的時候，將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的所有政黨都應當從政治舞臺上消失”。毛澤東還斷然否定與國民黨“南北分治”或走“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sup>④</sup>斯大林對毛澤東這一想法十分重視，在此句電文旁畫了雙分隔號，但當時沒有給予回復。1948年3月15日，毛澤東再次致電斯大林，表示半年後可強渡長江，預定在1949年成立“中國人民民主共和國”中央政府，預計全部戰爭將在五年內（1946年7月算起）結束。<sup>⑤</sup>4月20日，斯大林對毛澤東的兩封電報一併予以回復，以上級對下級指示的口氣明確表示：“一黨制”的方案目前不可行，“我們不同意這樣做”；“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之後，中國政府，按照自己的政策，至少在勝利

① 1949年7月27日，斯大林在與劉少奇會談時做了罕見的自我批評並表示歉意，他說：“由於不瞭解情況，我們過去曾經給中國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給你們的工作帶來困難，干擾了你們。”此次會談記錄《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未收錄，斯大林的談話見《劉少奇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49年7月27日），《劉少奇文稿》第1冊公佈了部分內容。轉引自沈志華：《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115頁。

② 《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中有相當數量的反映蘇聯援助的文獻。

③④⑤ 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第446、212、243頁。



之後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的時間長度現在還很難確定）內將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sup>①</sup>顯然，斯大林從毛澤東的來電中看出了其在軍事勝利形勢下政治傾向的激進化，而這種取向已經越出了“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的範疇，也不符合斯大林對中國革命進程的控制框架，因而給予直截了當的否定。毛澤東立即領會了斯大林的意圖，問題的實質不在於革命進程如何把控，而在於不能逾越斯大林劃定的紅綫，因為這涉及中蘇兩黨的關係，更涉及對斯大林領導地位的服從。4月26日，毛澤東回電斯大林，誠懇地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見，同時要求訪問蘇聯（這是他第二次提出訪蘇要求，第一次是在1947年6月，因內戰全面爆發而推遲），表示“想就政治、軍事、經濟及其他重要問題，廣泛聽取聯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議和指導”，並“在蘇聯實地考察有關軍事、經濟、政府及政黨的問題”；“此外，如有可能，我想到東歐和東南歐訪問一下，以便研究一下他們的人民陣綫工作及其他工作”。<sup>②</sup>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已經意識到在重大問題上與蘇聯對錶並保持一致的必要性。然而，斯大林決意要冷卻一下毛澤東的熱情，在隨後的9個月內以各種理由三度推遲毛澤東訪蘇的要求，其中7月14日的推遲理由竟然是“由於糧食收購工作已經開始”，“領導同志”要去各地視察，無暇會見。<sup>③</sup>在毛澤東訪蘇問題上，斯大林的行為表達出兩種意圖：一是機會主義，在中國政權更迭沒有塵埃落定之前，他不願將自己與中共的關係完全暴露，以維持與西方大國在遠東的勢力平衡；他後來在向毛澤東解釋時表達為：“您的莫斯科之行會被敵人利用來敗壞中國共產黨的聲譽，攻擊中共是依附於莫斯科的附庸力量。當然，這無論對中國共產黨還是對蘇聯都是不利的。”<sup>④</sup>二是以此讓毛澤東明白，中共在內戰戰場上雖然有自主權，但在中蘇關係的演進上不能超越斯大林的既定步驟。上述兩種意圖中，後者對中蘇關係的影響更具實質意義。

到1949年初，斯大林意識到必須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做出新的決斷，以確立與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國家關係。於是在幾次婉拒毛澤東訪蘇的請求後，他派米高揚（А. И. Микоян, 1905—1970）秘密訪問西柏坡，將自己對雙邊關係中存在疑慮的一些重大問題擺上檯面，亮出底牌，以測試毛澤東的態度。

在米高揚與毛澤東的會談中，蘇方最關心的就是：中國革命勝利後毛澤東如何定位新形態的中蘇關係（對待斯大林的態度尤其重要），以及中共建國後如何對待雅爾塔協定給予蘇聯的權益。斯大林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會談，但在莫斯科遙控指揮，通過密碼電報每天聽取米高揚的彙報並立即下達指示。從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米高揚在西柏坡期間與毛澤東舉行了七次會談，內容涉及中國革命和中蘇關係的方方面面，但最具實質意義的仍然是蘇方關心的兩大問題。

就中蘇關係的定位，毛澤東給了斯大林一顆定心丸。會談一開始，毛澤東就以謙虛的態度表示“中國是如此地落後於俄國，我們是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自己“沒有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做出什麼新的貢獻，也不能把自己放在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同等的位置”，“斯大林不僅是蘇聯人民的導師，也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導師”，他自己“是斯大林的學生”。<sup>⑤</sup>在以後的幾次會談中，“毛澤東多次強調，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學生，他堅持親蘇的方針”。<sup>⑥</sup>對於這番表白有多大的真誠度，米高揚的看法是，“這是東方人表示謙虛的一種風格，但這與毛澤東在實際上對自己的認識是不相符的”。他認為，當時在向斯大林報告的時候，斯大林“是很明白這一點的”。<sup>⑦</sup>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在於毛澤東願意服從斯大林的領導，不做鐵托（J. B. Tito, 1892—1980）式的“叛徒”。<sup>⑧</sup>這纔是斯大林最需要的表態。

圍繞雅爾塔協定和中蘇條約問題，在2月4日和2月6日的兩次會談中，雙方展開了試探性的對

①②③④⑤⑥ 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第251、253、267、346、369、431頁。

⑦ “米高揚關於1949年訪問西柏坡的報告（1958年9月4日）”，《冷戰國際史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第18輯，第418頁。

⑧ 在與米高揚的談話中，毛澤東特意就南斯拉夫問題表態，譴責鐵托為“叛徒”（《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第410頁）。

話。毛澤東首先提出一種假設，“外蒙古和內蒙古可以合併，並加入中國”；對於這種試圖收回外蒙的打算，米高揚當即給予斷然否定，指出“外蒙古早已獨立”，中國政府“也承認了外蒙古的獨立”，“如果有朝一日它與內蒙古合併，它將成爲獨立的蒙古”。這時“毛澤東大笑起來，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sup>①</sup>儘管如此，斯大林對毛澤東的這一試探並未掉以輕心，他接到米高揚的電報後立即回復並要求轉告毛澤東：“外蒙古領導人主張按獨立統一的蒙古國原則將中國所有蒙族地區同外蒙古合併。……我們認爲，即使所有蒙族地區都統一成一個自治地區，外蒙古也不會放棄自己的獨立而在中國版圖內實行自治。自然，這事的決定權屬於外蒙古自己。”<sup>②</sup>此舉讓毛澤東明白了蘇聯的底綫，他看了電報後表示“不再提出蒙古統一問題”。<sup>③</sup>當談到1945年的中蘇條約時，米高揚主動提出“蘇中關於旅順地區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隨着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蘇聯政府決定廢除這個條約，一旦對日和約簽署，馬上就從旅順撤出自己的軍隊”；關於中長鐵路的條約也“沒有完全體現平等的原則，我們願意討論這個問題”。這一表態“使毛澤東和政治局委員們非常意外，使他們坦稱驚奇”。中國領導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說，現在，不能從遼東撤軍，不能撤離旅順基地”。毛澤東還表示“感謝蘇聯簽訂了這個條約”。至於中長鐵路，毛澤東說，在確定資產歸屬問題上“有些小問題，可以就地解決”。<sup>④</sup>米高揚的表態是按照斯大林2月5日的電報指示，其意圖旨在試探毛澤東對中蘇條約的態度，即是否會提出廢舊約、訂新約的要求。看來，毛澤東理解這一試探的用意，他用肯定中蘇條約正面價值的方式消解斯大林的疑慮，表示現在還不是修改條約的時間，祇有當“我們可以管理自己”的時候，纔會去“重新研究這個條約”，“那時我們簽訂一個類似蘇波條約的蘇中互助條約”。<sup>⑤</sup>米高揚也看出了這一點，他在後來的回憶中說，或許毛澤東“這樣做是出於戰術上的考慮”。<sup>⑥</sup>此外，在雙方會談中，斯大林還給毛澤東出了一道“誰是主要敵人”的選擇題，並故意誘導中共“把矛頭對準英國人”，讓中國人“奪取香港”。毛澤東沒有被誤導，他明白斯大林最擔心的是中共與美國建立良好關係，因此堅持以美國爲當前的主要敵人，並願意“容忍英國佔據香港”。<sup>⑦</sup>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表達了與斯大林不同的看法，卻得到了蘇方的認可；米高揚認爲毛澤東是正確的，其實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答案。

米高揚的西柏坡之行代表斯大林完成了對毛澤東的面試。此後，中蘇關係的中方主體完全轉移到中共這邊。接着，通過1949年6月劉少奇秘密訪蘇和7月1日毛澤東公開宣佈“一邊倒”，最後確定了中蘇關係的新形態。

## 五

蘇聯與中共和蘇聯與國民黨政府兩種關係的進展與消退，不僅反映出中國政局的變化，同時也在國際格局上調整着雅爾塔體系。由於蘇聯將中共納入其遠東勢力範圍，而中共又憑藉蘇聯的支持大大加快了戰勝國民黨的進程，儘管蘇聯與中共的正式結盟還有待新中國的建立，但在戰局已定的情況下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將擴展到中國的遼闊領土已是指日可待，再加上原本已經走上蘇聯模式道路的外蒙古和北朝鮮，遠東的政治色彩已然是一大片紅色。這種結果不僅遠遠超出了當年美蘇劃分遠東勢力範圍時的設想，也是斯大林用兩手策略謀劃戰略佈局時所始料未及的。

斯大林接受毛澤東的新中國並願意在相對平等（與國民政府相比較）的基礎上重建中蘇關係，並不等於他放棄了在勢力範圍中控制中國的戰略意圖。如果說蘇聯的對華政策有所變化，主

①④⑤ 沈志華 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第421、442、442頁。

② 此電報《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未收錄，轉引自“米高揚致蘇共中央主席團報告：1949年1—2月的中國之行（1960年9月22日）”，《冷戰國際史研究》，第18輯，第425頁。

③ “米高揚致蘇共中央主席團報告：1949年1—2月的中國之行（1960年9月22日）”，《冷戰國際史研究》第18輯，第425頁。

④⑦ “米高揚關於1949年訪問西柏坡的報告（1958年9月4日）”，《冷戰國際史研究》，第18輯，第418、414—415頁。

要表現在：從原來雅爾塔體系框架內控制中國的東北地區轉變為超越雅爾塔體系、在“世界革命”層面上賦予中國以特定角色並使其承擔莫斯科給予的革命任務的新形態控制方式。<sup>①</sup>並非偶然的是，在1950年初中蘇新盟約簽訂的同時，斯大林決定發動朝鮮戰爭；這既是對毛澤東“忠誠度”的考驗，也是以此將中國拖入與美國對抗格局的一盤大棋。因為，祇有在中美對抗的格局中，蘇聯纔能讓中國長期地“一邊倒”，並且在“世界革命”的機制中保持莫斯科對北京的領導地位。此可謂“醉翁之意不在酒（朝鮮），在乎山水（中國）之間也”。

問題在於，中蘇關係的新形態和蘇聯為順應這種新形態而啟動的“世界革命”機制決定性地改變了雅爾塔體系，從而使戰後國際秩序在世界範圍內從“大國合作”走向“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

從美國的立場看，中共在內戰中的勝利和蘇聯勢力範圍的擴大，使美國在遠東的勢力範圍明顯縮小，這無疑從整體上破壞了雅爾塔體系的框架。與遠東地區政治變動幾乎同時，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內也進行了制度模式的輸出，即所謂東歐國家的“蘇聯化”。這些國家的政治變動原本在雅爾塔體系的框架中，因為劃分歐洲勢力範圍的“百分比協定”給予蘇聯控制這些國家的權力。但是，東歐的“蘇聯化”如果與亞洲的革命連接起來，勢必會帶來更大的“溢出”效應。此前，希臘內戰中共產黨武裝的壯大、蘇聯對土耳其和伊朗的領土及資源要求已經使美國和西方世界感受到蘇聯在“百分比協定”的邊緣和未明確劃界地區的擴張慾望。邱吉爾（W. L. S. Churchill, 1874—1965）的“鐵幕演說”表達了西方世界對共產主義“鐵幕”西移的恐懼，也刺激了美國充當“自由世界”領袖和保護者的救世主心態；肯南（G. F. Kennan, 1904—2005）對“蘇聯行為”的分析，則給出了美國威懾蘇聯的理由。以“希土危機”為由頭，“杜魯門主義”已經吹響了遏制蘇聯擴張的號角，而後“兩大陣營”的劃分因中國加入蘇聯一方而真正具有了“兩個世界”對抗的全球性質。

正是在亞洲和歐洲接踵而至的一系列事態的推動下和雙方的互動式反應下，美蘇關係背離了雅爾塔體系精神，走上了“冷戰”的軌道。就冷戰歷史進程而言，很難確切地說冷戰發端於亞洲還是歐洲。事實上，這是一個互相聯繫難以分割的過程。而就雅爾塔體系的調整來看，美蘇遠東勢力範圍的變化顯然是更具決定意義的事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檔案文獻中揭示的斯大林的遠東戰略佈局和中蘇關係的變化與亞洲冷戰的起源有着內在的聯繫。當然，這種調整和變化都不是事先“計劃”的行動，任何一方都沒有蓄意去打破雅爾塔體系，而是在具體落實勢力範圍劃分和大國權益的過程中暴露出體系的結構性矛盾並在應對這種矛盾時各方展開的博弈所導致的結果。斯大林的戰略佈局調整原本是要解決一個“局部性”的問題，即如何確保在中國東北的權益，但在具體操作中不可避免地因為中共因素的介入和中國革命邏輯的推動而演變為一個“全域性”的問題。而從根本上說，這個“全域性”的問題並非突然產生，早在共產國際時代即已制定的“世界革命”藍圖終於在戰後國際秩序的調整中獲得了現實的條件——中共領導的新中國進入了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於斯大林來說，這是意外的收穫，也是因勢利導的結果。從原來的戰略目標出發，他並不想破壞雅爾塔體系，也無意發動對西方國家的冷戰，但是，“世界革命”的機制一旦啟動，並在亞洲取得如此巨大的進展，客觀上已經改變了雅爾塔體系，於是就難以避免與西方世界的衝突了。

雅爾塔體系是兩個異質制度的大國在戰爭條件下結盟的產物，而戰後勢力範圍的劃分及對各自地盤的控制使原來被遮蔽的制度異質性在政權建構中顯化了，被劃入勢力範圍的那些國家的本土性革命因素與大國政治交織在一起，最終將戰後世界一分為二，形成了“兩個世界”對抗的格局——“冷戰”的根源和本質即在於此。

① 1949年6月劉少奇訪蘇期間，中蘇兩黨正式討論了世界革命中的分工問題，斯大林要求中共履行對東亞各國革命所承擔的責任（沈志華：《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第116頁）。而此前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時已經非正式地討論了建立以中共為首的“共產黨東亞國家局”問題（《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第410—411頁）。